

论鲁迅诗歌中的楚文化因子^①

王吉鹏,王慧敏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鲁迅的诗歌受楚文化影响甚大,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形成了其独具“鲁迅风”的艺术表现;与老庄、屈原人格精神相通,使鲁迅成为破中国之沉寂而呐喊的骚人;楚文化中传统的宗教思想、神话传说成为鲁迅诗中常见的典故,影响着他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 鲁迅诗歌;楚文化;浪漫主义;个性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1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5-0065-04

On the Chu Culture Element in Lu Xun's Poetry

WANG Jipeng, WANG Huimin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Lu Xun's poetry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Chu culture. It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romantic spirit of Chu culture, and finally formed its own artistic performance with "Lu Xun style". Being interlinked with the personal spirits of Lao-Zhuang and Qu Yuan, Lu Xun became a great writer who cried out and broke up the silence of China. The myths and fables i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ideas of Chu culture usually appeared in Lu Xun's poems. These common literary references created deep impression on the style of his poetry.

Key words: Lu Xun's poetry; Chu culture; Romanticism; Individual personality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从1900年春天写下的第一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最后写下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一共写有旧体诗51题67首,新诗12首,这些诗是他生活和战斗经历的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造诣。以浪漫主义之风为主的楚文化对鲁迅影响甚大,他的诗歌中留下了大量的楚文化因子。楚文化系统上影响甚大的老庄哲学和屈骚文学的精神风格,渗透在鲁迅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形成其独具“鲁迅风”的艺术表现。

一、浪漫风格的传承

中国文化自古由特征明显的南北两大系统构

成,北方文化严谨朴实,注重现实;南方文化活泼善辨,务求浪漫。南方文化中,楚文化成就最为突出,这主要与楚地特定的地域环境相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患。”这种优越的生活环境相对于北方那凿地穿冰的艰辛来说,自然有一番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趣,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楚文化活泼奔放以至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风格。

最能代表楚文化精神的是老庄和屈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把“道”这种虚幻抽象的理想作为文艺的根本目的,为了更好地表达“道”,他们采用一种放荡不羁、怪诞幻想的超现实主义,于

^① 收稿日期:2010-01-03

作者简介: 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慧敏(1987-),女,山西五台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是由而产生其神话式的幻想、大胆的夸张、离奇的情节、神妙的人物、夸张的语言等,其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始祖。而屈原,更是以其高洁的情操、巧丽的才思、博洽的见闻、无拘无束的想象,以一曲“离骚”将楚文化的浪漫之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文学史上,《庄》《骚》并列,以其瑰丽奇伟的形象哺育着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他的文章多用来做醒世的警钟、批判的武器,但读鲁迅的诗歌,我们却能够看到一个柔肠百结的“人间鲁迅”。他的诗,融合了一生的爱与憎,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些诗歌风格迥异,但都包含着鲁迅真挚热烈的情感,相比于他的小说与杂文的现实主义特点,其风格却是浪漫主义的。

首先,诗人作诗,必是“缘情而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盖诗人者,撷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1]⁶⁵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庄子“意出尘外,鬼话连篇”正是由于他对俗世的轻蔑。同样,鲁迅的诗中也饱含着他博大的情感世界。其中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之豪迈之情;有“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的乐观之情;有“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的企盼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感伤之情,诸如“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的离别之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之情;“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伤悼之情;“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的恨世之情,等等。在1900年和1901年,鲁迅曾两次共写了6首诗表现兄弟手足情深,如《别诸弟》;后来《答客诮》中“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再现了鲁迅拳拳的爱子之心;《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更是感人至深的爱情表白。此外,鲁迅诗歌中表现友情的诗句也是比比皆是,如《为了忘却的纪念》《悼杨铨》《悼丁君》《哀范君三章》《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都表达了鲁迅与朋友间患难与共的情谊。

鲁迅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气质,他早期的几首抒情诗,或即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情思宛转,寄托深远。如1900年秋所作的《莲蓬人》,逼似屈原咏物而颂己身之修养,把莲蓬写得那样芳洁清幽:“芰

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既是咏物,又是写人,寄托了自己朴素、高洁的情思。《祭书神文》是一首骚体诗,也是鲁迅作品中浪漫主义色彩最浓的一首,诗人驰骋想象,构思新奇,辞采华美,通过书神和钱神的对比,抒发了自己蔑视富豪权贵的感情。

《楚辞》对鲁迅的影响甚深,鲁迅对《楚辞》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书信、论文和文学史著作中。在其诗歌中,同样也有《楚辞》的影子。鲁迅诗歌有17首直接使用了楚辞的词语,另外有几首完全是“骚体诗”,如《战哉歌》《哈哈爱兮歌三首》等,还有的则通篇运用楚骚的形象和词句。写在反文化“围剿”年代的《送O·E·君携兰归国》中,首句“椒焚桂折佳人老”,^[2]用屈原诗的古意,以古喻今,既含悲凉之情,又具激励自我之志。1932年的《无题》诗中,“洞庭木落楚天高”、“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3]是引用《楚辞·九歌》和《渔父》中的内容作典故。《自题小像》中“寄意寒星荃不察”,^[4]“寒星”引自宋玉的《九辩》,“荃不察”则出自于屈原的《离骚》。屈原以神话入诗,写湘君、湘夫人,表达他的幽怨孤寂。鲁迅还作过一首《湘灵歌》,从现实的角度反观神话,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象。在鲁迅笔下,湘灵所弹的不再是清怨之曲,她要破现实之“太平”,扰乱社会偷逸苟安的心理,“皎如皓月窥彤云”,窥视着历史的曙色。这是鲁迅站在时代高度表达出来的独特审美诗情。

鲁迅后期的作品,风格开始转向慷慨沉郁。由于白色恐怖的沉重,黑暗现实的压抑,诗人饱经忧患,悲愤郁结,感慨百端。这时期的诗歌都蕴含着一种郁怒情深的铮铮誓言。但是,鲁迅很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尤其在诗歌中,他注重表达的含蓄。他曾说过,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长歌当哭也应在痛定之后。即使是他的讽刺诗,也是于温婉中见硝烟,给人憨厚之感。哀而不伤、愤而不激构成了鲁迅诗歌情感的主色调,所以历来评论者认为浪漫主义是贯穿鲁迅诗歌作品始终的。

二、个性人格的相通

诗人往往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大都以道自任。屈原生在一个黑暗腐败、小人当道的时代,空怀一腔报国热忱却无处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只能借他的《离骚》释愤吟志。这种“忧愁幽思”在其后

积淀于历代诗人的心理深层,并形成一种情感模式,被称为“屈原式情结”。而“狂诵《离骚》”的鲁迅,就是受屈原情结的驱动,发而为诗的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是他们共同的诗歌主题。

鲁迅为民生的艰难而痛苦、焦灼,为追求美好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理想而孤独地跋涉,苦苦地探索着。但他又不同于历代骚人仅仅把对民生的疾苦停留在同情的层面上,更富有参与性和鼓动性。他的诗歌也像他的杂文一样,是战斗的武器,往往伺隙乘机,以一击制敌死命,这尤其表现在他后期的诗歌中。黑暗的社会现实让鲁迅成为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那杆笔。从1930年的《无题》到1935年的《亥年残秋偶作》,都含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鞭挞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控诉。还有一些讽刺诗,如《教授杂咏四首》《赠日本歌人》《我的失恋》等,则讥讽社会上那些落后现象和恶劣习气,体现了鲁迅自五四以来一贯批判旧文化、旧势力、旧思想的战斗精神。

无论是老庄的散文还是屈子的诗歌,抑或是楚国的帛画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的中心地位和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强烈欲望。老子曰:“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是他独立于尘俗之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修养,是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庄子更是一个极力追求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诗人、哲学家,“以为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屈原一生积极追求理想,保持孤芳高洁的美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不为人理解的孤独者。

鲁迅从青年时代就立下报国之志,也有着与世难容的孤独感。他接受尼采的个性主义,“任个人而排众数”,介绍那些被目为“摩罗”的浪漫主义诗人,即与这种潜在的“孤伟”情结有关。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寄意寒星荃不察”的苦闷使鲁迅成为中国第一个破中国之沉寂而呐喊的骚人。而“五四”落潮后的沉寂,又让鲁迅产生了“彷徨”之感。这种彷徨犹如屈原之上下求索,高举远游,又如庄子《逍遥游》中“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但是鲁迅的上下求索并不像庄子和屈原的虚无,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在于“我以我血荐轩辕”,在于“俯首甘为孺子牛”,而这样的追求使他最终成为人民所理解所崇敬的革命家、诗人。

楚人乐于思考,长于思辨,楚文化中思辨、怀疑、否定的精神在老庄哲学中有深刻体现;而屈原

主张改革,否定腐朽的政策和官吏制度,与老庄哲学一脉相承。回到现实中,老、庄、屈都有着深刻的批判精神,老子对统治者的严刑峻罚、苛刻残暴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和抗议:“圣人不仁,以百姓以为刍狗”;庄子以整个社会作为怀疑和批判的对象,指责统治者“窃国大盗”;屈原更是上至帝王,下至群小都敢怒斥之。在这一点上,鲁迅与他们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面对“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题》)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社会现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与他从小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人生经历有关,他雄浑、坚韧的性格,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性追求可以说是相通的。鲁迅衷心喜爱屈原,他既看到了屈原诗绵延无已的魅力,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审美尺度,让一切怀有屈原之忧愤的诗人从沉郁中抬起头来,“发为雄声,以起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82}认为中国诗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需要经历一次“哲学的突破”。

可以说,鲁迅的诗歌,正是他个性最直白的显现,他有着与古代楚地文人相知相通的个性精神,又有着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

三、宗教文化的浸润

站在楚地社会历史文化高度来看,楚文化有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又有着独具魅力的宗教传统。由于楚民族地处荒僻的江汉之滨,相比于中原大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其风俗习惯、意识摆脱不掉崇尚鬼神的原始宗教思想。楚地一直保留着崇巫尚风、亲鬼好巫的文化传统,巫风神话的影响在《楚辞》中表现尤为突出。《离骚》中有巫咸降神的传说,《招魂》中有巫阳下招的典故,屈原诗中描写的奇异的服饰、芳洁的祭品,都是与楚文化中的神巫性密切相关。这种宗教文化也渗透到了鲁迅的诗歌创作当中,主要表现为神话和宗教色彩典故的运用。

民族精神孕育于神话,神话往往是构成诗的审美情结的原型,屈原就是在楚地的神话传说中找到了他精神远游的诗域,他“哀高丘之无女”,故求宓妃,见贱女,留二姚,从而在他的诗歌世界里留下了这些高洁的湘灵形象。在鲁迅的诗歌中,也多处用到了楚地湘灵的神话典故:在《无题》中,有“一枝清

采妥湘灵”；在《悼丁君》中，也有“可怜无女耀高丘”；另外，还有一首完整的《湘灵歌》。与屈原诗相比，颇具古风新意。

另外，鲁迅诗中还有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典故。比如在《自嘲》一诗中，他写道：“运交华盖欲何求”，“华盖”指“华盖运”。作者在《华盖集·题记》中说：“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5]在《题三义塔》中，“偶值大心离火宅”，“大心”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道教是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起于老庄，根植于荆楚大地。鲁迅在他的《小杂感》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6]道教所体现的理念在于人的自由和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庄子强调“自由”是人的天性，只有“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自由，而社会因素是造成人的不自由的主要原因。对此，鲁迅与庄子的理解有着诸多的一致性，他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争取人的自由于国于民的重要，并以自己独立的人格践行了一生。

道家的精神在于“无为”、“虚无”，庄子的虚无主义也同样影响了鲁迅，更体现了鲁迅的深刻与矛盾。鲁迅也曾说过自己“在思想上中了老庄和韩非的毒，时而很峻急，时而很随便”。历来研究者认为，鲁迅所说的“随便”就是指受“虚无”的道家思想影响。^[7]如在诗歌《悼杨铨》中，“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诗人写得如此平淡，不露痕迹，如庄子一样冷眼看花开花落。《无题》一首有“惯于长夜过春时”，一个“惯”字，写出了作者无尽的平淡与冷漠。《自嘲》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不正是一种“无为”的表现吗？这样看来，这

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鲁迅的世界观中有“随便”的一面，也有“峻急”的一面。这种“峻急”在于对黑暗社会的无情鞭挞，对罪恶统治的犀利批判。正是因为同庄子一样，能够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所以才有更深刻的批判。《悼杨铨》后两句“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长期潜藏的感情如火汹涌而出，达到了最高潮。鲁迅的“随便”与“峻急”形成他矛盾的痛苦纠结；他知人论事的深刻与“刻毒”的洞察，又超越了道教的“虚无”，使鲁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楚文化传统的文化精神渗透在鲁迅诗歌中，得到了升华，鲁迅的个性精神则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深深影响着后人。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坟·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集外集·送O·E·君携兰归国[M]//鲁迅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7.
- [3] 鲁迅. 集外集·无题[M]//鲁迅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3.
- [4] 鲁迅. 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M]//鲁迅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7.
- [5] 鲁迅. 华盖集·题记[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 [6] 鲁迅. 而已集·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6.
- [7] 王吉鹏. 鲁迅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61.

责任编辑:黄声波